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丛书

民主·自由·人权

张 坚 姜汉斌 王 炜

解放军出版社

民主·自由·人权

张坚 姜汉斌 王炜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6.125 印张 110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65-1508-3 / D · 152

定 价: 2.45 元

社编号 2-083

前 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风波，以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赢得了伟大胜利而载入史册，它留给人们的反思和教训，必将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尖锐复杂，在这样的重要时期，我们更应牢牢记取建国以来的宝贵经验，切不可忘记沉痛的教训。

建国40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面对大量的活生生的事实，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结晶，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们曾有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一些方面的落后状况短期内还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待于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探求和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G0439105

会主义道路，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去年的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他严肃地说：前几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近几年来的事实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警惕和反对“和平演变”是长期的斗争；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对立和斗争也是长期和复杂的。

为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生动地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廓清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了的一些思想理论是非，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实实在在的教育，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严肃的重要任务。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丛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摆事实讲道理，对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作深入的阐述；对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错误主张和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对当代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和历史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求。

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之际，把这套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献给读者，期望能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有所裨益。由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七月

目 录

●一个焦点问题	(1)
●斗争由来已久	(1)
●动乱“精英”的旗帜	(10)
●“和平演变”的工具	(13)
●廓清迷雾	(16)
●两种对立的民主观	(22)
●民主的阶级性不容抹煞	(22)
●民主的历史演进	(26)
●中国人民需要的民主	(33)
●有没有绝对自由?	(61)
●什么是自由?	(61)
●“自由世界”并不自由	(67)
●社会主义自由也是相对的	(74)
●绝对自由与无政府主义	(83)
●怎样看待人权?	(88)
●人权问题的历史发展	(88)
●资产阶级高喊人权的实质	(93)
●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	(102)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本质	(107)
●战后沧桑	(107)
●万变不离其宗	(115)

●“趋同论”的虚妄	(133)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141)
●崭新的民主类型	(141)
●曲折道路的探寻	(150)
●制约民主进程的基本因素	(155)
●分层次逐步推进	(162)
●“大民主”行不通	(167)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173)
●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	(173)
●民主要扩大，专政要坚持	(179)

一个焦点问题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民主、自由、人权问题是一个突出问题，占有特殊地位。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压制民主、剥夺自由、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民主斗士”、“自由先锋”和“人权的捍卫者”，以此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企图达到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依附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国的目的。而一些青年人虽然抱有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愿望，但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的阶级实质往往不甚了解，存在模糊认识。因此，澄清民主、自由、人权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斗争由来已久

“民主、自由、人权”是一个很老的问题。早在奴隶制时代，就有反映工商业奴隶主要求的“民主”和“自由”。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市民阶层的形

成，“民主、自由”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城市共和国”。然而，“民主、自由、人权”真正成为一面旗帜，还是在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之后。资产阶级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民主、自由、人权”也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政治概念。资产阶级从商品等价交换中，从奔波各地的贸易中，从同宗教神权的斗争中，萌生和形成了“民主、自由、人权”的要求。他们高举着这面旗帜同封建专制主义作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预言的那种“普遍的”、“全民的”民主和自由。相反，“民主、自由、人权”仍然被限制在剥削阶级的狭隘框子之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仍然被排斥在民主、自由之外。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自然把争民主、争自由的目标列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之中。他们在自己的理论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为建立更高类型的、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而斗争。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历史阶段。“民主、自由、人权”从此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被赋予全新的内容。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健全、完善和发展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却打出了属于过去时代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的某些缺陷、失误以及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现象，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波。

在我国，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在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风波之前，大的较量已经有两次。

第一次较大的斗争，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几年里。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转折点。这一年年底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力加强民主。全会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册，人民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10—11 页）这是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英明决策，它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全国人民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信心。

但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借机发难，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口号下面，掀起了一个旨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民主风潮”。他们不听党和政府的劝告、引导和解释，煽动无政府主义，提出了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蛊惑和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上街闹事。他们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并成立了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张贴大字报，要美国人“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放肆地诽谤毛泽东同志，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掀起了一股“上访”风潮。虽然上访者中，多数人确有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有的还是蒙冤多年的受害者，但极少数另有图谋的人混在其中，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泄不满。在北京“西单墙”，一些人利用当时尚未取消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手段，张贴了大量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小字报，有的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一些非法组织打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的幌子，在青年中吸收成员，扩大组织，创办非法刊物。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唯恐天下不乱，互相串联，秘密开

会，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团体，企图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二次革命”。

在思想理论界，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有的人主张：“发表反革命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公然鼓吹超阶级的言论自由。有的人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客观上为所谓“争人权”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根据。还有的人大讲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认为产生“异化”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文艺界，极少数人宣扬没有任何前提的“创作自由”，否定和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一些内容很不健康的文艺作品相继出台，有的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用艺术形式推崇和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同时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冒出了一些错误观点。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79年春，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绝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发扬民主绝不能搞自由主义；要求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

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他还科学地论述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党的领导以及权利和义务等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和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页)

1979年12月,北京市根据中央的决定,取消了“西单墙”。1980年全国人大专门作出决议,废除“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8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要严格防止借口批‘左’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就会把无产阶级的‘双百’方针混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由于邓小平的多次重要讲话和中央采取的必要措施,使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掀起的所谓“民主风潮”受到了有力的扼制。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态度不够坚决,旗帜不够鲜明,从而为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较大的斗争，发生在1986年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终于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少数人通过非法的大小字报、传单和标语口号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其中心内容仍然是所谓“民主、自由、人权”问题。

首先，这次自由化思潮宣扬和诋毁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民主、自由、人权。一些大小字报宣称“‘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斗争，只是打倒了一个现实中的偶像，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说什么解放几十年来，“中国公民并没有得到或真正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在国家的名义下充当官僚特权的奴仆，只为国家尽义务，民主成了点缀品。”有的大字报攻击我们的现行政治制度，说“中国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政协等等是专制政治的花边，独裁统治者的遮羞布。中国的统治者只懂得一种统治方法——专制和愚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马家独存”、“社会主义香花独放”。

其次，这次自由化思潮还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要向中共争民主。少数人搬出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宣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即天赋人权，而不是党给予的。”他们扬言，为了取得这些权利，要继续搞“民主运动”，“不能寄希望于党由上而下地赐予民主”。他们煽动说：“要获得我们每人应有的一份民主，我们必须进行斗

争”，“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和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携起手来，抵制赤裸裸的假民主”，并为此“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这次自由化思潮鼓吹要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改造中国。有的人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民主，是“由于中国革命超越了历史阶段，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因此，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这一课。他们主张，在中国现阶段，要“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要实行“三权分立”，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

第四，这次自由化思潮还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极少数人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个性绝对解放，选择绝对自由。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扼杀了人的个性，现在迫切的要求是，承认个体的价值以达到全社会完全的民主。公开鼓吹要提倡“新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宣扬“个人主义并不是排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个人奋斗，甚至自由主义，都可以拿来对付封建主义，发展个性”。为此，他们对宪法已经取消的“四大”十分留恋，主张继续使用“四大”。有人公开说：西单“民主墙有什么不好”？“大字报不失为民主的一种形式”。

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借“民主、自由、人权”问

题再次兴风作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敲警钟，并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和斗争。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在全党全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陈云着重谈了党风问题，强调要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李先念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一齐抓，不可偏废；一定要加强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在分析民主、自由问题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决议》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并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决议》还明确指

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同年底，邓小平针对学潮中提出的错误观点，又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52页）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鉴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贯彻不下去，会议批评了当时个别主要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态度，并作出了重要的人事变动。

但是，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新上任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采取和推行退让、姑息的方针，刚刚开始反击就草率收兵，因而为以后更大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动乱“精英”的旗帜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持续多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终演变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这场风波中，“民主、自由、人权”是动乱“精英”们的一面旗帜。

他们鼓吹的所谓“民主”，就是要实行资产阶级